

● 蒋永福

学术良知、学术启蒙与学术期刊

——写给《中国图书馆学报》创刊50周年

摘要 学术良知是学术理性的首要内容,是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紧密联系的。学术期刊的启蒙作用主要体现于三方面:引领学科发展,不断推出学术精品;弘扬科学精神和学术理性,反对功利学术;倡导学术自由与民主,繁荣学术研究。对于前二者,《中国图书馆学报》都做得很出色。建议该刊增设“学术专论”等栏目。参考文献6。

关键词 学术良知 学术理性 学术启蒙 学术期刊 《中国图书馆学报》50周年

分类号 G230

ABSTRACT Academic ethics is a basis of academic reason,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The enlightenment roles of academic journals are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leading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nd releas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promoting scientific spirit and academic reason and opposing utilitarianism, and promoting academic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is good at the former two aspects, and proposes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journal. 6 refs.

KEY WORDS Academic ethics. Academic reason. Academic enlightenment. Academic journal. 50th anniversary of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CLASS NUMBER G230

1 学术良知与学术理性

学术良知是学术理性的首要内容。在这里,我不想对“学术良知”作出一个精准的定义(恐怕我也做不到“精准”),但我知道,学术良知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学术良知”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在基本要义上几乎可以等同相待。说到知识分子,在中国语境中,恐怕很多人把它与“有知识的人”相等同。其实这种理解是一种莫大的误解。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必须与“社会的良心”和“文化、意义、价值的立法者”相联系起来理解。“知识分子”这一词,在英语世界中一般有两个对应词:一个是 *intelligentsia*,主要用来指称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和乌托邦式的理想的人群;另一个是 *intellectual*,主要用来指称追求普遍真理,崇尚自由,伸张正义,抗击不公,揭穿权力的谎言,保持自身独立性的知识界群像。《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有关条目指出:“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所谓‘知识分子’除献身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益

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1]从以上陈述我们可知,知识分子决不仅仅指“有知识的人”,更不仅仅指有高学历、高学位的人,对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其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批判精神。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批判精神的人,是在社会不公平面前敢于呐喊、批评的人,是在权势面前不摧眉折腰的人,是在功利面前不见利忘义的人,是在权威面前不马首是瞻的人……在这种意义上,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乱现实的人”,应该“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2]。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如今,学术理性、学术良知、学术自由等学术价值,普遍被扭曲、被践踏,成为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心中难以抹去的一种痛。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天职责任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像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3]。尤其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知识分子只是在具体领域中工作的专家,葛兰西意义上的“抵抗的知识分子”已经死亡。用福柯的观点说,现代知识分子的最大悲哀来源于知识成为“权力的眼睛”,知识分子成为权力体制的一部分;那种“以真

理和正义之宗师的身份言说”的角色或那种“好像代表了我们大家的意识和良知”的知识分子,已经退出历史舞台^[4]。

后现代主义的近乎危言耸听的“解构”情结,固然不能全面反映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结构,我们不必为之心慌脚乱,但我们有必要重视和检省学术理性的衰微之势。就拿中国图书馆学界来说,以功利为目的的思想观点及其“垃圾文字”大量有之,以“馆里需要”或“管理需要”为谎言的“有偿服务论”者、“产业化改造论”者仍有之,等等。在这些论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学术良知已泯灭,学术理性已消解。

要想成为学术理性的守护者和建设者,与其成为现实的奴隶,不如成为超越的启蒙者;与其成为现行体制的附庸者,不如成为体制弊病的批判者;与其成为“莫谈政治”的伪道士,不如成为改进现行制度安排的积极的献言献策者。这才是“建设式知识分子”应具有的学术理性。

责任意识,批判精神,积极建构的态度,不屈不挠的追求,不卑不亢的骨气与不畏得失的勇气——这就是我们对学术理性的基本理解。

2 学术启蒙与学术期刊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启蒙永远是“智者→愚者”的单向作用过程。我认为,启蒙应该是双向乃至多向的相互作用过程。在这种相互作用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相互启发、相互指点、相互论辩、相互包容、相互勉励,是启蒙的基本作用方式。不过,这种相互作用必须要有能够相互作用的“场域”,对学术启蒙来说,最好的或不可或缺的“场域”就是学术期刊。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学术期刊可能就是发表学术论文的地方。在我看来,学术期刊——是学术共同体的精神家园,是学术先觉者畅论学术观点的阵地,是学术后觉者“入学”的平台,是各种学术声音“百家争鸣”的园地,是传播先进知识与理念的“媒体型大学”,是每一个学术人生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从而慰藉心灵的幸福港湾……对我个人而言,学术期刊是我学习前人或其他人知识与智慧,从而不断得到学术滋养与启迪的“无声的启蒙老师”。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学术期刊属于市民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它包括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其中私人领域是指由市场对生产过程加以调节的经济子系统;“公共领域”则是由各种非官方的组织或机构构成的私有有机体,它包括团体、俱乐部、党

派、沙龙、报纸杂志书籍等。公共领域实际上是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它为人们提供了讨论和争论有关公众利益事务的场所或论坛,在这里理智的辩论占主导地位。哈贝马斯认为,具有理性——批判精神的公共领域才是“正宗的公域”^[5]。具有理性——批判精神的公共领域,主要有三方面的功能:一是以相对自治的公众力量抵御国家权力(哈贝马斯称“系统世界”之一)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二是批判和监督公共权力,使其保持合法性界限;三是启蒙、教育和凝聚公众,使其具有理性的判断和保护自我能力。哈贝马斯尤其重视报纸、期刊等公共媒体对公众的启蒙教育功能。是的,学术启蒙是学术期刊必须具有的本质性功能之一。对我国来说,国家级学术期刊的学术启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①引领学科发展前沿,不断推出精品;②弘扬科学精神,高擎学术理性,反对功利学术;③倡导学术自由与民主,繁荣学术研究。在我看来,《中国图书馆学报》(以下简称《学报》)在①、②方面国内本学科首屈一指(至于第三个方面“学术自由”问题在我国有其特殊性,故在此不谈)。

在引领学科发展前沿,不断推出精品方面,《中国图书馆学报》自从1991年《通讯》改为《学报》以来,我们几乎每期都能看到若干学术精品。这些学术精品,无论是大师级(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的精深之作,还是年轻学人的激情快语之作,都能使我为之振奋、为之叹服,从中得到无尽的启迪。诸如:“文献学新论”(周文骏,1994)、“面向21世纪图书馆学研究的新趋向”(吴慰慈,2000)、“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新增长点”(张晓林,2000)、“知识空间:知识组织的概念基础”(王知津,1999)、“数字图书馆:定义、影响和相关问题”(汪冰,1998)、“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范并思,2004)、“图书馆人与图书馆精神”(程焕文,1992)、“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与情报科学的技术传统”(卢泰宏,1992)、“从信息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公共图书馆发展的社会环境”(于良芝,2002)、“再论图书馆服务”(程亚勇,2002)、“公共知识空间与图书馆”(王子舟,2006)……无一不是广受人们称道、高频被引用和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人最高理论成就的精品之作。

在弘扬科学精神,高擎学术理性,反对功利学术方面,《学报》无疑也表现出了公认的表率。在办刊理念上,《学报》始终坚持国际先进,国内一流,瞄准学科前沿,打造学术精品的高品位理念。在办刊风格上,始终坚持学术期刊的“阳春白雪”本色,不随波逐流,不粉墨装点。在选文范围和标准上,长期坚持优势栏目(如“理论研究·实践研究”、“事业发展·现代化建

设”等);每篇文章都追求高品位、高起点、高标准;不求发文数量,只求文章本身的质量;不纠缠于“理论是否脱离实际”的争论怪圈,只求是否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在抵制功利学术上,只看文“不看人”,拒绝人情稿;不在创收或收费上不择手段,而是不折不扣地推荐新人、推动学术。在科学精神与实用技术的关系处理上(“道”与“器”的关系处理上),既重视图书馆学应用性特点(重“器”),又突显学术期刊的基础理论研究使命(重“道”),道与器相得益彰、相映成辉。说到道与器的关系问题,我国图书馆学历来有重“器”的传统,此传统本身无可厚非,问题是重“器”的人往往轻视甚至鄙视重“道”的人,这种轻视或鄙视是万万要不得的。“器”的意义在于手段,属于方法论范畴;“道”的意义在于目的,属于认识论范畴。手段和目的应该相互支撑,不应相互偏离,但两者又不能画等号。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推崇爱因斯坦的如下一段话:“科学,如果要繁荣,就不应当有实用的目的。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律,科学所创造的知识和方法,只是间接地有助于实用的目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要等到几代以后才见效。对科学的忽视,其结果会造成缺乏这样一类脑力劳动者,他们凭着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判断,能给工业指出新的途径,或者能适应新的形势。凡是科学研究受到阻碍的地方,国家的文化生活就会枯竭,结果会使未来发展的许多可能性受到摧残。”^[6]

3 两点建议

在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学报》的一代一代编辑人,为《学报》的发展和辉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就。《学报》已然成为中国图书馆学人为之骄傲和欣慰的精神家园和学术瑰宝。在此,我向《学报》的现任和以往的所有编辑人表示由衷的敬意,也为《学报》的五十华诞表示诚挚的庆贺。然则,也为《学报》的精益求精或锦上添花,下面冒昧提两点建议:

(1)可增设并组织“学术专论”(非时政专论)栏目,主动组织国内外资深专家对重大学术热点问题或急需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发表研究性或评论性文章(甚至可以采取笔谈形式)。如对当前中国图书馆学界来说,图书馆立法建议、图书馆核心价值的确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公共图书馆定位等,就是当前中国图书馆学界急需探讨和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按照吴慰慈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宏观现实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国内各专业期刊正在陆续而分散地进行当中,若《学报》能够及时

跟上并专门组织研究,将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2)有必要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进行“大师寻踪”系列研究。我这里所说的“大师”是指国内外图书馆学界著名人物,“大师寻踪”是指介绍和研究学术大师的生平与学术功绩。我们知道,这方面的论著以前并不是没有,甚至还有某一大师的专门性纪念活动及其文集,但以往的介绍和研究过于集中在寥若星辰的个别大师级人物上,覆盖面太窄。如我们比较熟悉刘国钧、杜定友等个别大师人物的生平与事迹,但还有很多著名人物我们只知其名或只知其点滴而不知其全面。在图书馆学论著上经常提到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国外的爱德华兹、杜威、鲁巴金、巴特勒、谢拉、麦克考文、伯德萨尔、尼蒂奇、布罗德非尔德、巴克兰德、德尔文、雷福德、哈里斯、福斯克特、瑞蒙德、戈曼等,我国的孙毓修、戴志骞、杨昭愬、马宗荣、洪有丰、李小缘、袁同礼、李景新、俞爽迷、徐家麟等,我们所知不多,不识其全貌。学术立于大师,学科历史离不开全面寻觅大师,学术后人不应不了解或忘记学术前人(尤其不能不了解或忘记学术大师)。我国目前的图书馆学研究,其实存在一个“历史记忆缺失”的问题。不尊重历史的学科,是一个无根的学科,甚至是一个“缺德”的学科。这样的学科无颜面对学科未来继承人。把“大师寻踪”的重任只交给《学报》,也许是不切实际的(似乎应该由中国图书馆学会来全面组织),但《学报》若能在这方面“小试一刀”,也将功德无量。

以上建议,只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 1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423
- 2 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 三联书店,2002:2,6
- 3 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刚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三联书店,1987:142~143
- 4 福柯著;严峰译.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28
- 5 哈贝马斯. 公域的结构转变. 见:邓正来. 国家与市民社会.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24~137
- 6 爱因斯坦著;许良英等编译.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 商务印书馆,1979:94

蒋永福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通讯地址:黑龙江大学。邮编 150080。